

中外名记者丛书

赵超构

晁鸥/则玲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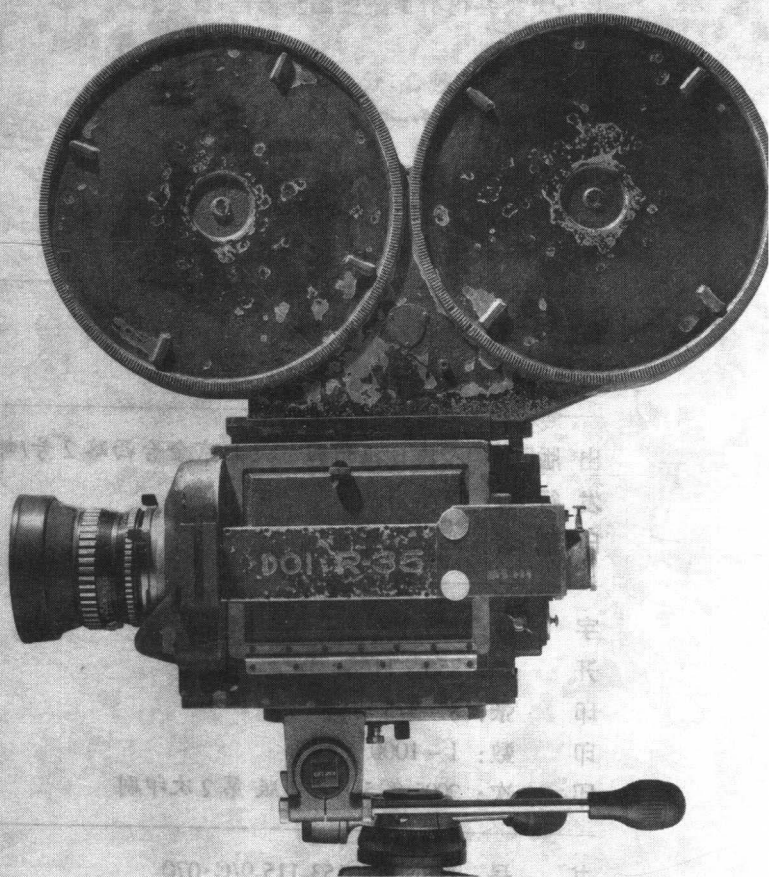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外名记者丛书

赵超构

晁鸥/则玲 著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超构/晁鸥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0.5

(中外名记者丛书)

ISBN 7-80153-115-9

I. 赵… II. 晁… III. 赵超构—评传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8) 第 08212 号

书 名: 中外名记者丛书——赵 超 构

著 者: 晁鸥 则玲

责任编辑: 颜景政

出 版 者: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邮编: 100733)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铁建印刷厂

字 数: 180 千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375

印 数: 1—1000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53-115-9/G·070

定 价: 25.80 元

编者的话

中国、外国都有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由于他们发表过大量成功的新闻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探讨中外名记者成长的道路，借鉴他们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培养我国新一代的名记者，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服务。

这套丛书的编辑体例是：每位名记者各占一本，每本15万字左右。前面是专家对他们的评传，后面是对其作品的精选。

目 录

人物评传	(1)
前 言	(1)
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3)
经济专论初露才	(11)
《朝报·小评》专栏——与马寅初论“傻报”	(14)
《战时各国宣传方策》	(24)
进《新民报》——“今日论语”专栏开笔	(29)
“未晚谈”专栏开笔	(33)
《延安一月》	(40)
红岩与毛泽东长谈	(46)
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刊	(49)
走避香港	(55)
香港论报	(60)
参加开国大典	(62)
探索晚报新路子——林放“时事随笔”专栏	(65)
鸣放中的“随笔”专栏	(67)
“短广软”晚报三字经	(71)
“杂文家难得”	(76)
《辞海》之恋	(79)
林放文章老更成——“未晚谈”复出	(82)
飞入寻常百姓家	(86)
作品选编	(90)
《朝报·小评》专栏及社论	(90)

新说难	(90)
官腔狗格	(90)
傻官	(91)
傻官与傻报——答马寅初先生	(92)
中国金融危机之诊断(社论)	(93)
周岁的话	(95)
生命力的表现	(96)
十二月九日	(97)
宣传之本义及其作用	(99)
《今日论语》、《未晚谈》专栏及其他	(101)
赶快献金	(101)
赋得“今日论语”	(102)
悲剧的角色	(103)
文章和人物	(104)
关于胡适放林损	(106)
问题之人物	(108)
“党八股”	(109)
《重庆私语》跋	(110)
《重庆客》小引	(112)
《灯前客话》小引	(113)
恨水的创作表现	(114)
邹韬奋先生	(116)
《论语》复刊	(117)
大钞失色	(119)
“噙”内阁	(120)
割卵财政	(121)
粒米三元	(122)

楣画解说	(123)
《新民报》之厄运	(124)
《延安一月》	(125)
毛泽东先生访问记	(125)
端午节访丁玲	(130)
延安文人群像	(135)
写完了《延安一月》	(139)
《时事随笔》、《随笔》专栏	(142)
桔子和苹果	(142)
“从何说起”！	(143)
续“片面”三题	(145)
“片面”无忧论	(147)
先锋何在？——记者的自劬和不平之鸣	(149)
《未晚谈》专栏及其他	(151)
父女俩	(151)
有理教太公	(153)
“尾巴”翘得好快呀！	(154)
诤友	(156)
花好月圆书长寿！	(158)
杂文之春	(160)
望乡之情	(162)
小仙姑不必脸红	(165)
江东子弟今犹在	(167)
闲煞与忙煞	(168)
假如茅盾不当部长	(170)
临表涕泣	(171)
喜见“人格”又归来	(172)

“溢美”也能成灾	(173)
“文革”还在揪人	(174)
以牛为师	(175)
“若烹小鲜”	(176)
应似飞鸿踏雪泥	(177)
漫画与民主	(179)
《今日谈》的魅力	(180)
《辞海》之恋	(181)
“勃焉”与“忽焉”	(183)
昂纳克搭错了船	(185)
说话与听话	(186)
晚报论	(188)
报纸的大与小	(188)
新国家与新报纸(摘录)	(189)
“短广软”——新民晚报的特点和风格	(192)
关于社会新闻的一点意见	(195)
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 ——兼谈新民晚报是怎样一张 报纸?	(198)
复刊的话	(210)
生平年表	(212)

人物评传

前言

赵超构(林放、沙,1910—1992),是中外名记者中颇具特色的民间报人、专栏作家。

他于1934年,怀抱经济专业知识,踏进报坛,矢志以“言论报国”、“走韬奋的路子”,从经济评论与“小评”专栏开笔。在六十年如一日的笔耕中,焚膏继晷,孜孜兀兀,经常一日一文,力耕数以十计的专栏。解放前,以脍炙人口的“今日论语”专栏(1941—1948)赢得读者。特别是“未晚谈”专栏(1943—1992),历经新旧两个社会,波折三起三落,时跨半个世纪风云,兑现“写呀写呀直至最后一口气”才终笔的诺言,是赵超构人格、报格、文格的结晶。他用数以万计的专栏评论,构筑蔚为奇观的小言论长城,是我国报刊史上名副其实的专栏作家。他的专栏评论,在师承邹韬奋小言论及鲁迅风格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它既有韬奋那种直言快语抨击时政的特点,又有鲁迅那种幽默、讽刺、尖锐、泼辣的杂文味。他的专栏内涵,以世象、社会批评为主体,视点笔触所及,宏观宇宙之大,微观苍蝇之末,上至领袖伟人,下及平民凡人,乃至“有理教太公”的小娃娃。纵笔所至新闻热线人物当以千计。所评世象、社会问题,常常引起社会舆论效应,其文常为权威报刊转载,其言常常触及最高决策层的神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与重视,甚至引为决策依据。专栏所含有的深刻的历史沉思与浓郁的文化意蕴,又由他那支被文论家王元化誉为“鲁迅式金不换”的笔,生发出一篇篇带有艺术性、富于文采的新闻性随笔式杂文:信手拈来,随物赋形,挥洒自如,涉笔成趣;在语言上明快浅显,通俗易懂,平易近人,拥有广泛的经久不衰的读者群,因而被时人称之为“林放式杂文”,并认为“达到了中国报纸上艺术性短文、评论的新高峰”。

作为新闻记者,赵超构走的是由编辑、主笔而记者的独特道路。重听,“一向无记笔记习惯”的他,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

观团,行程九千里,历时70天,特别是对延安进行了为期34天的参观、考察、访问,就凭心记、感悟、理解,写下了约13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首次客观公正地报道了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并提出“新社会试验区”的新概念,立时引起轰动性社会效应,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毛泽东看了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把这篇报道比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日本也很快翻译此书出版。

赵超构又是一位勇于探索晚报之道的敬业报人。他开笔不久,便与马寅初笔谈探索“傻报”之道,以“认真”(记真事、认真理、讲真话)、“为民喉舌”的“傻报报人”为追求目标。在他六十年报人生涯中,几乎年年都有议论为文办报之道的专栏文章。历经长期的新闻实践与探索,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的晚报方针,接着又勇闯禁区,发表《关于社会新闻的一些意见》。关于“软些”的提法,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与评论。直至晚年,年逾古稀的赵超构,在《新民晚报》复刊时,还提出了“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的十六字晚报方针,拈出“可读性”这一晚报学新概念,又借用刘禹锡诗句,把他的办报宗旨,衍化为文学形象“飞人寻常百姓家”,一时成为他长期苦心经营的《新民晚报》的报格标志。在他的鼓吹下,80年代一度掀起晚报热,报纸销路上扬至160万份。一些大报亦引进他的办报经验,从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新闻家又是社会活动家。赵超构的社会活动也十分活跃。毛泽东七次接见他,并作竟日长谈、长夜之谈;周恩来常以老朋友相称。他是《新民晚报》终身社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记协副会长、全国晚报协会会长、上海市政协常务副主席。他与夏衍、郭沫若、叶圣陶、苏步青等都有交谊,临终住院前夕还访晤巴金。

综观赵超构一生,以牛为师,甘愿“掏一把出来”;曾用笔名“牛之初”、“孺子牛”;专栏题饰以牛,诗赞《春牛》,“牵犁力足奔千里,负轭材堪破万丘;劲健爱亲泥土气,情深勤作稻粱谋”;遗体告别覆以牛,墓碑饰以牛。林放牛也,牛也林放。

“一笔曾当百万师 手不停椽至去时”。这是新闻舆论界在他逝世后对他的一生的概括。

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生地龙川

赵超构，字景熹，笔名林放、沙。1910年5月4日（宣统二年庚戌三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省瑞安县龙川乡。龙川乡今属文成县，这个县是1946年由瑞安、青田、泰顺三县交界的部分地区析置而成的。县内原属青田县南田区的武阳村，是明代开国元勋刘基的家乡，因以刘基谥号“文成”为县名。超构14岁以前主要生活在这里，外婆家也在这个县的南田区梧溪村，所以他对文成县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晚年之作《望乡之情》中说：“我原是文成山区出身”、“我这个山头人”；到老还能讲一口纯正的家乡话。1924年，超构随父迁居瑞安县城郊仙降区江云乡屿头村，所以他又自称是瑞安人，常见之于书面。

如果说有地域文化学，那么文成与瑞安对超构的新闻思想、新闻文化乃至新闻人格道德，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龙川乡是个赵姓聚族而居的大村落，超构生活时期已是“三四百个烟灶（户）的大地方”，“神龙吐信（舌），一川中流”，在四围山色中，一川龙溪从村子当中静静流过。村背后山6公里许，是高度号称神州第一瀑的百丈漈（省级风景区），飞流直下，声震岩阿。村庄对面山上的天然石笋将军岩、纱帽岩，昂首高耸云霄。这是飞云江上游一个风光绮丽的江南典型山村。抗日战争期间，著名文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曾来龙川乡浙东第三临时中学任教。“校书觅句有新功”。就在龙川，王季思完成了力作《西厢记校注》的同时，“觅句”吟成《龙川杂兴二首》、《我从龙川来》、《一九四四年龙川双十节》、《龙川感赋》、《别龙川》等多首诗篇，其中直接生动描绘龙川一带风光的有：

我从龙川来，蹶屣凌嵯峨；
群山聚成海，四望无平波。
中峰见怒瀑，下注百丈坡。
灵区閼奇气，偶泄为江河；

遂成利济志，声裂震岩阿。

王季思以诗人、学者的敏感，似乎已觉察到“灵区”文成山区所蕴藏的潜动的“奇气”。从六百年前的刘基到赵超构，从《郁离子》到《未晚谈》，就文化意蕴来说，似有某些讽喻文学的默契与传承。赵超构那一篇篇善于揭露“金玉其外”的表象，抨击“败絮其中”的本质的杂文，不正是当代的“卖柑者言”吗？笔者曾借王季思诗句拟一联：

郁离林放，六百年间，灵区闷奇气；

未晚卖柑，双文今古，声裂震岩阿。

赵超构出身“三代带廩”的书香门第。曾祖父赵恒东，祖父赵廷儒、父亲赵标生都是廩生。“文章版半，17岁带廩”的父亲，更为乡里称道。他“勤奋好学，资质聪颖”，当年县考，常与同年人陈怀（字孟冲，陈介石犹子侄、北京大学教授）争榜首。后来标生投笔从戎，历任政军官员。1948年告老还乡，1948年1月病逝瑞安屿头。乡人盛传标生较开明，具卓识，淡名利。同村族叔共产党人赵刚1927年来龙川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国民党派兵追捕，时在瑞安城里的赵标生预闻后，星夜派人密报，幸免于难。

超构的母亲富氏，是南田区梧溪村人，端庄贤淑，聪敏秀丽，心地宽厚，平和善良，具有山区人所特有的质朴纯正的气质。也许是大家庭繁重家务的劳累，以及长房长媳所处的复杂处境的难于适应，她终于不堪其烦而变得体弱多病，不幸得了肺病。头胎、二胎，孩子一出世便夭折了。后来母亲怀上姐姐富荪，再后来怀上超构时，家人便采取了保护措施，婴儿一离开母体，母亲便被隔离起来，让奶妈哺育。超构就是吮吸一位畚族山村农妇的奶汁长大的。山区农民淳厚的气质，孕育了超构质朴、勤奋、坚韧不拔的品性。他终身“以牛为师”，六十年笔耕至最后一口气的新闻人格成因，也许从这里可以找到一点信息。年过六十瘦小老人超构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时，还能挑120多斤重的一担水，了解这个底蕴也许就不会感到“乖乖，我奇怪这老头子怎么没有被压扁”了。

体弱多病的母亲只活到45岁，便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同春祠塾

“14岁以前，我在山区读的是私塾”，超构在《望乡之情》中回忆说。超构3岁随母赴北京，在父亲任所度过幼年，而他的童年则是在曾祖父创设的同春祠塾中度过的。

城里一阵风，乡下一层浪。说到同春祠塾与名噪一时的晚清瑞安文化特征“东瓯布衣”有很大关系。当时著名瑞安学者孙衣言（“承先启后一巨儒”孙诒让之父）“方自江藩归田，提倡乡先哲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宋儒永嘉之学，设诒善祠塾，以教乡人，与弟侍郎锵鸣，最负时望。……吾乡谈文学、数人才，苟非诒善祠塾，则必求志社。”就在孙衣言、孙诒让父子所倡导的“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为特色的永嘉事功学派影响下，围绕诒善祠塾、求志社，出现了以“温州三杰”陈介石、宋恕、陈虬为代表的“东瓯布衣”人才群落。这群不做官的读书人，著书立说，慷慨激烈，力主维新变法，赢得梁启超、谭嗣同的推重。梁启超诗赞宋恕是“东瓯布衣识绝伦，梨洲以后一天民”，谓他是黄宗羲后反对君主专制第一人。1913年陈介石还应梁启超之请，为其父撰《梁涧溪先生七十序》。陈介石等人一经梁启超《新民丛报》的鼓吹，“影响很大，近远数百里，乃至千里之外的北京都知道‘东瓯布衣’”。超构曾祖父、祖父考取了廪生后，一直不愿出仕为官，以布衣自居，其深受影响的标志是仿照诒善祠塾的结构格局，在龙川下村村尾，兴建同春祠塾，课子读书。又在瑞安县城郊隔江屿头村兴建赵宅，就近请教。他与求志社的陈介石、陈虬、池志征等颇有交谊，后来，超构姐姐富荪就是嫁与陈介石之侄孙陈仲公的；而池志征一巨幅书法，则长期挂在龙川下新宅中堂。

“东瓯布衣”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无疑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个有待开发研究的思想研究课题。他们寓海之滨，远离官场，探讨引进西方民权思想，曾经建立近代“桃花源”的尝试。他们结社求志，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好议论。宋恕的《六斋卑议》，陈虬的《经世博议》、《救时要议》、《东游条议》、《治平通议》等等，光看书名，可见一斑。特别是陈介石，本世纪初在上海主编的《新世界学报》，“文章之锐进，理想之灿烂”，梁启超等人叹为“我报界进步之征”。1889年宋恕著《高议》书成，“每与人言，即触世怒，且忌者将欲兴大狱，乃尽火其稿”；陈虬、陈介石等人“结求志社，聚集城北槐吟馆，夜庐风雨，道古谈今，每漏下三鼓始归”。其敢言与谈兴，特色鲜明。学者指出“超构杂文的特色是‘好议论’”，就这一点来说，超构未始不是“东瓯布衣”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声。他日后写的专栏评论中，40年代的《社会贤达不宜做官》，80年代多次出现《仲尼之门不称官阀》、《书呆子不宜做官》、《落实何须乌纱帽》、《假如茅盾不当部长》

等类文字；他的老搭档蒋文杰所谓新民老报人“有几分屈贾气”，“有几分老庄气”；他的至交石西民在位时曾托朋友带信给他，“请赵注意不要过分以‘布衣’自居”，具见东瓯布衣余响。但东瓯布衣的主要特点是“识绝伦”，他的延安之行，他的数以万计的专栏评论则塑造了胆识型社会批评专栏作家形象。

同春祠塾既然是这种东瓯近代思潮的产物，它便有与时具进的特点。随着时代的步伐，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东瓯乃至广大浙南地区，很快地接纳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早在建党初期，这里就有党的活动，1924年正式成立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同春祠塾莘莘学子中，就有两位率先参加了共产党。一位是超构的叔公赵刚，另一位是比他大三岁的堂哥（同祖父母）赵超演。赵刚（1887—1930）1925年在杭州铁路段工作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杭甬铁路总工会执委，中共杭州中心县委书记，1929年被捕，1930年英勇就义。1956年经超构证明，由当地政府上报国务院追认为革命烈士，是文成县278位烈士中惟一由国务院直批的。赵超演（1907—1938）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5月红十三军攻下大岙镇、龙川乡等地，成立瑞安西区苏维埃政权，超演任苏维埃委员，后任职南京步兵学校教官，抗日时任国民党军队营长，1938年在长沙率部欲与幕阜山中共游击部队联合抗日，事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耳闻目濡，潜移默化，这两位同春祠塾的先后学友，多少给超构以影响。

关于超构的私塾生活，他在《望乡之情》中有如下回忆：“十四岁以前，我在山区读的是私塾，背诵四书、左传，枯燥乏味，毫无乐趣。又因为私塾出身，没有学过数学，对中学里的数理化功课，学得很糟。”超构的四书读本本是朱熹的《四书注》。他的启蒙塾师叫徐更卿，50多岁，生员出身，泰顺县人，不仅诗书满腹，还深谙医理，能切脉开方治病，远近颇有名气，还在瑞安县城里教过书。大约为了鞭策超构读好四书，给他取了个学名，字号叫“景熹”，后来景熹这个字号一直沿用到中学、大学，到《朝报》工作后还用为笔名。

私塾这种陈旧的，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教学方法，超构对此抱有批判的态度，感到“枯燥乏味，毫无乐趣”。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在他身上却产生了奇妙的效用。他把四书、左传背得滚瓜烂熟，因而练就了一套硬功夫——惊人的记忆力，这为日后从事新闻工作创造了条件。他熟背的四书、左传等古典文献，在当时并不懂

得书中的意思,但是少年时代储入脑海的经史知识,经久不忘,在以后的新闻写作中却受益无穷。他在小言论杂文专栏写作中,经常随手拈来,融经史人文,增加了文章的深度。有时还直接拈来制作标题,如《知耻近乎勇》、《君子和而不同》、《思无邪》、《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参也鲁》、《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过犹不及》、《非其鬼而祭之》……。超构上中学忙于补习数理化、英语,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他古典文化的扎实基础就是在这时期打下的。

迁居屿头

1924年,15岁的超构告别了生他养他的家乡龙川,走出山山之外,随父迁居瑞安县城郊屿头村。

屿头村在飞云江南岸,与县城隔江斜望,相距仅五里许,如乘舢板船顺潮水斜划,不到一个时辰,就可在县城西门码头进城。

“居善地”。(《老子》)超构祖父选中屿头这个地方兴建赵宅,是颇有一些眼光的。屿头这个小小的村落,在近代现代革命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曾闪烁过亮光。

1861年爆发的我国近代浙闽边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金钱会起义,其主要首领蔡华就是屿头人。这位被起义军称为“刘伯温”的拔贡秀才蔡华,在屿头应氏宗祠率众建立革命大本营,举起反清的义旗,事败,屿头陷落,壮烈殉难。

1928年6月,又是在屿头一带,共产党员林直斋、林贞甫、陈兰平组织农民武装六百多人暴动,事败壮烈牺牲。在三、四十年代,屿头始终成为新四军浙南游击纵队的地下主要交通站,许多革命青年经此过江进入五云山。

后来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出现著名鱼类学科专家、中科院学部委员伍献文,中外名记者赵超构。当时,屿头赵宅从同春祠塾那里搬来部分经史藏书,因地处宁静的乡村,无车马市喧,一时赵家姻亲陈介石子孙辈、林损(陈介石外甥)林尹(陈介石外孙)等,常来此处谈文论道,带来了瑞安文风。寓居台北的林尹教授晚年深情地忆及瑞安时,曾说:“瑞安县学风一向很盛,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出过不少进士举人。一般土人见面言谈,非诗即文。普通人都有起码的文学修养。”以上民气学风,或多或少在潜移默化着少年超构,在他那杂家学者型报人、报格中,可以看到一些痕迹。

忧时爱国

超构迁居屿头的当年(1924),便考入了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艺文中学。从私塾的子曰诗云,一下子跳到 ABCD,这与当时“东瓯布衣”及父亲的洋务思想有关。始终钦佩陈介石的赵标生在北京任职期间以同乡之谊,结交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介石及其子侄陈怀(超构姐夫陈仲公的父亲)。1917年陈介石弹劾段祺瑞祸国殃民,“直声震海内”。父亲毅然脱离段系南归,又受陈介石《商务论》的影响,在瑞安城里开山货行,准备积累资金,开办工厂,实现实业救国的美梦。他把独女富荪许配给陈介石侄孙陈仲公为妻;(陈仲公,商务书局编辑,经济地理学者,著有《日本侵华企图》,解放后曾任温州一中教导主任,1957年,遭贬含冤病故)又鼓励超构学好英语,搞洋务。超构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到温州艺文中学住校学习的。

在艺文学习阶段,由于超构得力于私塾的古文功底,他几乎不花什么功夫,国文就能拿下高分。可是数理化却不行,连加减乘除都没有学过,更不要说什么 $X + Y$,声光化电。然而凭他的悟性与记性,再加上刻苦,居然也达到免于留级的水平,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基础确实太差了,有时在课堂上简直不知所云。渐渐地他由不懂,到“对正经的功课感到乏味”。处于长身体、长知识阶段,“青少年时的精力又比较旺盛”的这个“山头人”,终于把求知的触角,伸向课外阅读阵地。他几乎像牛进青草地那样,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吞食着知识。渐渐地,超构便“养成了乱读闲书的习惯”。他的所谓“乱读闲书”,实际上是相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经”而言的,这是对基督教会,圣经教条教义的逆反。也就是这个“乱读闲书”,使他接触了“五四”以后的各种进步书刊。“接触到一些新文化,接触到一些第一次大革命前夜的风风雨雨”,唤醒了他的爱国心。

1925年,这是超构思想转折的一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温州人民在中共温州独立支部领导下,很快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成立“温州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温州青年在蔡雄、苏中常(仲翔、渊雷)等青年团员带领下举行集会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平时对饭前祈祷,星期日做礼拜,定期上圣经课等基督教一套强烈不满”的艺文中学学生,在李得钊

等进步师生带动下,纷纷走出课堂,上街游行,汇入爱国反帝的洪流中去。接着艺文中学全体学生,宣布脱离教会学校,在蔡雄等的积极领导下,创办了瓯海公学,由谷寅侯先生担任校长,让这些学生继续就学。

脱离教会学校,在超构的生命航程中,是一个转折点,晚年,他回忆说:

也正是由于乱读书,接触到一些新文化,接触到一些第一次大革命前夜的风风雨雨,唤醒了我的爱国心,因而在“五卅”惨案发生后,立即跟许多同学脱离教会学校,并且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从此彻底丢掉在洋大人鼻息下找“铁饭碗”的可耻念头。

关于教会学校,他在1936年发表的新闻评论中指出:“一般人都认为洋奴买办气息最重的是教会学校,可是五卅案一起,圣约翰学生反英行动最烈,全体一致脱校……他们有知识也有血气,他们全都看见国耻的事实,他们当然不能不对欺侮我们的人表示反感。”(《同文大学》,《朝报》1936年8月9日)

喜读杂书

超构脱离教会学校后,1926年进入瓯海公学。接着又考进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一中)读高中,直至1928年高中二年级被迫退学离开温州。

从进瓯海公学开始,超构就把零用钱节省下来订阅几份报刊,如《学生杂志》、《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和《时事新报》等。“从青少年时养成的习惯,真是非同小可,是可以影响一辈子的。”超构就是在温州五年读书生活中,养成了“乱读书、读杂书、跑书店的习惯乐趣”。当时,“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脉搏,仿佛在温州这个地方跳动,课外读物左中右都有,他都涉猎接触,“书读得有点乱”,“但免于死读书,香花毒草都接触过,多少有点免疫力,经常思考探索,不至于轻信一家之言。”超构回顾后总结说:“这对于我后来走上新闻工作的道路未始没有帮助”。从超构的“乱读书读杂书”的主要倾向来看,还是以进步的革命书刊为主流的。他自述这一阶段读的书,留下印象的是鲁迅的《彷徨》,郭沫若的《女神》,陈独秀、瞿秋白、肖楚女的政论文章,还有各流派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如《唯物史观伦理学》、《社会主义思潮》等等。他还经常到既卖《醒狮》也卖《响导》,及别处不卖的创造社会出版物的书铺购书。他